

索绪尔的消极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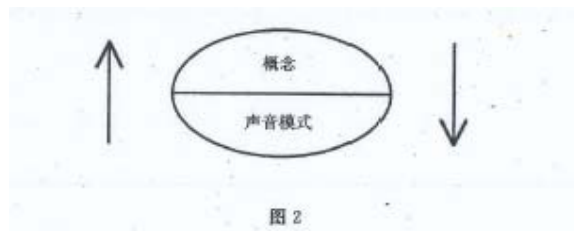
索绪尔是第一位正式将语言研究纳入符号学视野的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换言之，索绪尔十分强调语言的符号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立场使得他实际上将符号的核心(即符号意义)排除在语言学之外。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霍奇 (Robert Hodge) 和克莱斯 (Gunther Kress) 在他们合著的一本书中所说，“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价值的符号(系统或横组合与纵聚合结构中的位置)及其意指活动(语言外部的指称关系)。与在其他方面的做法相一致，他[索绪尔]选择作为考察对象的是价值(系统关系)，而不是意指活动。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意义载体)和所指(概念或意义)。索绪尔虽然没有完全忽视对所指的考察，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能指上面。”

¹ 索绪尔的这一选择导致了此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过分注重符号系统关系而忽视符号本身意义的不良倾向。

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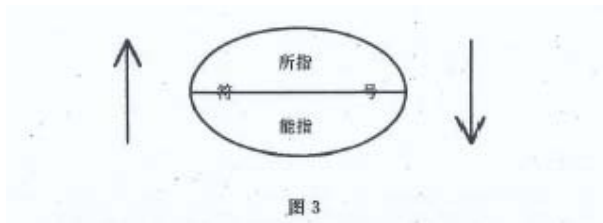
人类对语言的符号本质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把语言说成是表达心灵印象的符号，而文字又是口头语言的符号。尽管如此，直至 20 世纪初期，人们关于语言符号性的讨论要么旁敲侧击，要么只言片语，缺乏今日学术论证的严密和系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出版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在那本书里，索氏率先将语言同社会生活中其他各种符号系统相提并论，从而把语言研究放到了他所谓的“关于符号的统一科学”中进行。

要了解语言的符号本质，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语言符号这个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根本问题。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中，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定义为“概念与声音模式 (a sound pattern) 结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Open Court 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66 页。其中声音模式可被视作“物质”成分，虽然它只是一种听觉印象，而与它对应的则是更为抽象的思想单位。索绪尔用下图(图 2)来表示语言符号：



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就这样给语言符号下定义会带来一个术语上的问题，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符号”这一术语指的仅仅是声音形式。例如，人们常常把“tree”看成语言之外具体木本植物的符号。其实，“tree”之所以能够指称物体，是因为在该声音形式的背后还有“树”的概念。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符号的物质部分看成是符号的全部。为了避免这一术语上的歧义，索绪尔建议将语言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改名为“能指”和“所指”，而把这两者的结合称为符号(图 3)：

¹ 霍奇等：《社会符号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17 页。



一般说来，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人体的顶端部位”既可以用英语的语音组合“head”来指称，也可以用汉语的语音组合“tóu”来表示，只要使用特定语言的社团成员接受它们的用法，语音组合与语音组合之间没有高低或者优劣之分，它们都能够胜任连接“音”和“义”的任务。也就是说，“头”的概念和“tóu”的语音组合连在一起，其中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索绪尔在论及这个问题时说：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例如“姊妹”的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 s-o-r 这串声音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的存在就是证明：“牛”这个所指的能指在国界的一边是 b-o-f，另一边却是 o-k-s。²

在许多人眼里，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原则是现代语言学对整个人文研究的一大贡献，有人甚至认为它引起了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一场革命。从表面上看，索绪尔只不过在这里肯定了一个有关符号意指活动的非常传统的命题。在他之前，许多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经提出同样的观点，而且他们使用的几乎是相同的术语，如美国 19 世纪语言学家惠特尼 (William D. Whitney) 也讨论过“语言是习俗”的问题。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有着与众不同的解释。他接下来告诫读者，不要狭义地去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否则就会忽视这一基本概念深层含义。他说：

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没有人反对，但是发现真理往往比为这个真理派定一个适当的地位来得容易。上面所说的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诚然，这些后果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同样清楚的；人们经过许多周折才发现它们，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³

换句话说，要真正理解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一般人在理解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任意结合时，都倾向于把语言看成是名称的贮藏库，以为这些名称被任意地同事先存在的外部事物相连接。亚当给万物命名的圣经故事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正是这种普遍的看法需要我们去纠正。在索绪尔看来，概念本身是由语言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有先于语言或者先于符号的客观存在。因此，索绪尔所谓的任意性与人们一般理解的任意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其专门讨论索绪尔思想的著作中，卡勒 (Jonathan Culler) 就索氏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的特殊意义解释如下：

²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Open Court 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 67-68 页。

³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Open Court 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 68 页。

语言不是简单地给独立存在的概念任意命名。它一方面在自己选择的能指之间建立起某种任意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在自己选择的所指之间建立起某种任意关系。不同的语言不仅仅产生不同的能指组合，以独特的方式分割声音连续体，而且每一种语言都产生不同的所指组合；它以独特的因而也是“任意的”方式将世界分成概念或范畴。⁴

凡是有一定双语经验的人都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上面这段引文的含义。我们可以试着将“wish”这个英语单词翻译成法语。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里有两个词与来源(source language)中的词语在意义上接近：“vu”和“desir”，但这两个词所包含的概念范围却与它们在英语中的对应词不相等。“vu”的词义与“wish”的词义只是部分对应，只有当“wish”被说话者用来表达对别人的祝愿时，这两个词的意义才相同(该词词义的另一部分与英语中的“vow”相对应)。如果将“wish”翻译成“desir”，我们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desir”的概念范围大于“wish”，它的意义还包括英语词“desire”所表达的成分。类似的语言与语言之间在词语概念上的差异常常使翻译工作者感到头痛，但这恰恰证明不同的语言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切割所指连续体的。

通过上述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索绪尔希望揭示一条他认为十分重要的语言学原则，即语言不仅仅是能指与所指结合物的总和，它首先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必须以整体的存在为前提：

……把一项要素简单地看作一定声音和一定概念的结合将是很大的错觉。这样规定会使它脱离它所从属的系统，仿佛从各项要素着手，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可以构成系统。实则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从有连带关系的整体出发，把它加以分析，得出它所包含的要素。⁵

也就是说，语言在任何时候都呈现一定的组织形式，索绪尔把这种内在的语言组织称为系统，后来的理论家有时亦称之为结构。他认为，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找出与某一语言单位相对应的非语言物体或状态，然后说这是该语言单位的意义。相反，如果要确定某一语言单位，我们应该首先将这一单位放到它所处的整体组织中去，放到它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中去。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索绪尔打了一个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议的比方：在象棋里，具体棋子的特点完全是系统差别的一种功能。只要我们能够将一个棋子与其他棋子区分开来，它们的具体物理形状如何，是用什么物质材料做成的都不重要。假如“帅”这颗棋子不小心被丢失了，我们可以用任何尺寸、任何材料的物体来替代它，只要新起用的棋子不与代表不同价值的其他棋子混淆起来就行。同样道理，语言成分本身的物理特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是通过它与其他符号的“不重合”(noncoincidence)来获得自身价值的。我们假设有两个人在交谈，其中一个人说：“我最近在读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另一个人问道：“什么书？”“shu”在这里出现了两次，虽然这个声音组合的发音会因人而异，但我们仍然能够认出它们是同一语音符号的不同变体。那么，我们是如何确定这两组不同的嗓音属于同一个符号的呢？索绪尔的回答是，语音符号的识别牵涉到整个语音系统。能指并不是由这个或者那个讲话者发出的物理声音，而是与系统中其他成分相联的抽象单位。只要不跟其他符号混淆起来，该音素组合的具体发音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语言中所有的语音元素都处于连带关系之中，其中每个单项的价值都是其他各项

⁴ 卡勒：《费迪南·德·索绪尔》，企鹅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15页。

⁵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2页。

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这一情形同样发生在语言系统中的概念层次上。概念或所指不是由某些非语言的属性所规定的独立实体，它们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并被该系统的其他成分所规定。就以在非欧洲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学习表达颜色的英语词语为例。按照卡勒的解释，如果我们向学生显示带有具体颜色的物体，企图让他理解表达不同颜色的词语的意义，即使你将棕色物体显示 500 次，他还是不会知道什么是棕色。外国学生之所以掌握不了“color”这个词的意义，是因为英语所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区别棕色和黄色、棕色和褐色、棕色和红色、棕色和灰色的方式。我们在语言中看到的不是预先存在的观念，而是由系统发出的价值。所谓价值就是纯粹的差别，它的确切特征为：不是别的东西。“color”本身不具有某种本质的特征，它只是表达各种不同颜色的词语次级系统中的一员，因而其意义由与它相邻的描述其他颜色的词语所规定。以此类推，要把握任何一个成分的意义，就必须首先理解与该成分形成对照或区别的其他成分。索绪尔这样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语言中只有差别。此外，差异一般要有积极的要素才能在这些要素间建立，但是在语言里却只有没有积极要素的差别。就拿所指或能指来说，语言并不可能有先于语言系统而存在的观念或声音，而只有由这一系统发出的概念差别和声音差别。⁶

前面提到，索绪尔部分地接受了传统语言学的观点，把符号意义看做“听觉形象的对立面”，但他认为声音与概念的结合只不过是符号意义的一部分。出于系统的考虑，索绪尔反对将概念看成被简单地同声音系列结合在一起，因为无论是声音系列，还是概念单位，它们都跟系统内其他成分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图 4）：



索绪尔把这种联系称为“价值”（value）。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它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词既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具有一个价值；这完全是另一回事。”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14 页。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的系统关系分为两大类：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横组合关系指的是符号在具体意指过程中与周围其他符号结成的联系，这种联系只能在实际的话语中得以实现，主要表现为话语成分相互之间的联结和呼应。纵聚合关系依靠的是符号在能指或者所指层面上的形、义类似。在能指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类似现象包括具有共同前缀和后缀的词语、相互押韵的词语以及同音异义词语；在所指层面上，构成符号类似现象的是同义词和反义词。此外，有的符号可能同时在两个层面上相似，如法语里的“éducation”和“instruction”，它们既有相同的后缀，又都表达“教育”的意思。所有的符号都处在这两种结构关系之中，

⁶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 118 页。

它们的意义一部分由共处于相同系统中的其他成分所规定，一部分由具体话语中其他相邻的符号所规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论述超出了人们对能指与所指之关系的一般理解，我们只有把他的任意性原则与系统性原则连在一起考虑，才能够把握这一见解的深层意义，这也是正确理解和超越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关键。